

# 36年前国家交给他一个与阿富汗有关的任务，后来国家给忘了(三)



手写资料

到1981年，3年时间里车洪才和宋强民整理出了10万张卡片，他们把卡片放在木制的卡片箱里，塞进文件柜，足足装了30多箱。“那时的任务已经完成了70%，就快做完了。”车洪才说。

突然有一天，院里的领导找他谈话，让他把词典停一下，“让我为新设的专业做全国调研”，理由是“总该为院里做点事了吧”。车洪才临走前把装卡片的文件柜锁在外语系的办公室里，谁知道一锁就是20多年。调研回来的时候已经是1984年的春节，他心想：“这回该让我编字典了吧。”结果过完年他先是被要求组织开设广播电视函授班——这一干就是5年，“赵忠祥都曾是这个班的一员。”

结束之后又被外交部借调去巴基斯坦大使馆，那时候他已经52岁。这意味着他要从教学工作转到外交工作，还要在当地

学开车，每周都要穿上正装参加使馆的宴会。

他不乐意去，在家躲了3个月没有回复。外交部干部沉不住气了，车洪才印象很深刻，“我们家那时候都没有电话，后面传达室那儿叫我，喊我电话。我想谁打电话找我，结果是外交部的干部，哎呀能不能来一趟谈一谈。”

去了那儿他先是自己说身体不好，“有肾结石血压高什么的”，结果外交部医务室一查没事，可以去。结果就去了。而他的10万多张卡片还锁在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办公室的柜子里。他对此耿耿于怀很久，后来在写书面材料阐述词典工作如何停止时，他写道：“被强行调动，这项工作由此搁浅。”

到了晚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觉，经常拿一张巴基斯坦当地普什图语报纸，在上

面圈新的词汇，他想想就心痛，“这么多人的努力就摆在那里了。”

他也惦记着那些卡片的安全。出国前曾经发生过一件让他心痛的事，有一次外语系办公室装修，他刚好路过那儿，突然发现自己装卡片的柜子出现在水房，然后满地都是白色的卡片，窗户上、外面的水泥地上扔得到处都是。原来工人把卡片柜中间两个抽屉卸下来，拿出里面的卡片，铺在地上睡觉。

车洪才当时就疯了，“你们这是犯罪你知道吗？！”他冲着工人大发雷霆。“我一张一张往回捡，完了以后全部拿回家里面，女儿帮我排序查漏，有的字她不认识啊，有的看着像就往那儿搁在一块。”查到最后还是少了百儿八十张，他很伤心，卡片装在箱子里，他都不愿再看箱子一眼。

1992年4月，阿富汗纳吉布拉政权垮台，游击队接管政权，中阿关系实现了正常化，正在巴基斯坦的车洪才被派到了30多年没去的阿富汗。他又重燃希望，觉得可以为词典搜集资料了。结果没几个月，阿富汗内战加剧，中国大使馆人员全部撤离。

撤离之前，大使馆中了13颗火箭弹，宴会楼直接塌了，房顶也全是洞，还有一个火箭弹卡在上面没有炸。车洪才当时正躲在一边避弹，突然就觉得：“我的命运都不是我支配的。”

回国之后，已经没多少人还记得有一部《普什图语汉语词典》需要编写了。学院里的领导都已经更换了一批，没有人听他的汇报，也没有人给他安排新的工作。他完全被遗忘了。“档案里都没这段了，”夫人学平说，“那段时间他不跟人交往，人都有些不正常，没多久就退休了。”车洪才记得，第一次听说本·拉登的名字还是在2001年“9·11”事件之前。即便退休了，他仍然关心阿富汗局势，他分析塔利班里面应该有正规军混了进去，“不然不会那么快控制全国的局势。”结果不久之后就发生了“9·11事件”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拉开了对阿富汗塔利班组织战争的序幕，此后自杀性爆炸事件层出不穷，世界进入了一个“全球反恐战争”的时代。

由于长期在阿富汗作战，美国政府感到普什图语人才奇缺，还曾公开向全世界招聘既懂英语又懂普什图语的人才。这时候，北京广播学院也恢复了对非通用语

专业的招生，在家待了很久的车洪才被请过去教授普什图语。他偶尔会在课堂上提到那本没编完的词典，还有锁在箱子里的卡片，学生们都很惊讶，觉得“不编完可惜了”。

此时中阿两国的交往更加频繁，普什图语的需求很大。在甘肃，一个阿富汗人贩卖鹰隼，审判的时候没人懂普什图语，还专门从北京调了他的一个学生过去翻译；而一位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普什图语频道工作多年的领导，刚下飞机到了乌鲁木齐机场就被一群阿富汗人围住请他帮忙，因为他们不会填写出入境表格。这让他决心把词典编完。2008年不再教书有了完全闲暇之后，已经72岁的车洪才叫上原来在喀布尔大学的同学、一起编过词典的张敏，作为共同的主编来完成这部词典。“前几天我还打电话问他身体怎么样，他有前列腺炎，说最近还要再检查检查。我说不要紧，离死还早着呢，坚持把这个干出来。”

“反正也没事。”张敏乐呵呵的，“就是想给自己总结总结。”他现在需要把过去总结的词条重新校对一遍，还要往里面添加新的词汇。(未完待续)